

白语的发生学研究

——白语的历史层次分析和
异源层次的同质化机制



杨立权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白语的发生学研究

——白语的历史层次分析和
异源层次的同质化机制

杨立权 / 著

本书出版得到云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
语言文学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资助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邹 滢 王 璠

封面设计：向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语的发生学研究/杨立权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 - 7 - 5415 - 3209 - 2

I. 白… II. 杨… III. 白语 - 历史比较语言学 - 研究 IV. H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644 号

本书出版得到云南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资助

白语的发生学研究

白语的历史层次分析和异源层次的同质化机制

杨立权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18.5 字数: 500 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15 - 3209 - 2

定价: 45.00 元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0871 - 4611721)

目 录

自序：徐门问学记	(1)
绪论：走出“非汉即彝”的二元论黑洞	(6)
0.1 反思：白语研究一百年	(6)
0.2 黑洞：“汉白同源”论和“彝白同源”论	(13)
0.3 症结：共同精描与历史还原的脱节	(17)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术源原	(24)
1.1 起点：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	(24)
1.2 中国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理论模型	(32)
第二章 “三重证据法”与“历史层次分析法”相结合	(37)
2.1 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三大疑问	(37)
2.2 三重证据法与汉藏语言史研究	(39)
2.3 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藏语言史研究	(41)
2.4 结合的程序和难点所在	(42)
第三章 原始白语的发生与叠合（殷商—秦汉）（上）	(53)
3.1 原始白语的文化语境	(54)
3.2 原始白语的发生学源头	(61)
第四章 原始白语的发生与叠合（殷商—秦汉）（中）	(75)
4.1 白语和藏缅语关系字的鉴别原则	(75)
4.2 白语藏缅语（T-B）关系字字表	(76)
4.3 白语和藏缅语的语源关联深度	(116)

第五章 原始白语的发生与叠合（殷商—秦汉）（下）	(123)
5.1 原始白语和侗台语的关系	(123)
5.2 原始白语和孟高棉语的关系	(135)
5.3 原始白语和苗瑶语的关系	(163)
5.4 原始白语和上古汉语的关系	(171)
第六章 古代白语的整合与影响（秦汉—蒙元）	(174)
6.1 古代白语的文化语境	(174)
6.2 古代白语和中古汉语的关系	(178)
6.3 古代白语的语言影响	(181)
第七章 现代白语的异化与置换（元明以降）	(201)
7.1 现代白语的文化语境	(201)
7.2 现代白语的方言分化	(202)
7.3 现代白语的语言接触	(211)
第八章 “异源层次的同质化”	(229)
8.1 “异源层次同质化”的理论模型	(229)
8.2 白语的历史性归宿	(233)
8.3 悬而未决的问题	(235)
参考文献	(244)
后 记	(289)

自序：徐门问学记

2007年年初，学校还没放假，爱人就三番五次急催我到学校送她回浙江。情急之中，改完试卷、登好成绩，便直飞北京。没呆几天，两人又匆匆赶回江山。随后一个月，就一直忙着走亲访友、筹办婚事，弄得身心俱疲，就连给手机办漫游的事儿都给忘了。大年初四回到昆明，小妹就告知：李娟师姐来过好几次电话，说是为纪念徐老师要出文集，向我索稿，还说二月初就已截稿。听罢，半晌回不过神来。本想马上动笔，谁料事发仓促，千头万绪，一下子竟不知从何写起，甚至给师姐回个电话的勇气都没了。

就这样拖拖沓沓又是一个多月，到开学，方才想起还在等待出版的博士论文。当初答辩以后，就曾想过一待论文修订完稿，就向徐老师索序。岂料工作以后诸事纷扰，书稿一晾就是两年多。更想不到的是，徐老师竟突染恶疾，未几乘鹤西去。这序，就只有自己写了。写什么呢？最合适的自然只有五年多来负笈燕园、问学徐门的心路历程。

叩 门

第一次见到徐通锵老师的名字，大概是在大二下学期。当时，云大图书馆底层有一家书亭，经常进一些品位不俗的学术书籍。没课的时候，我总会到里面逛逛，泡个半天，不经意中总会刨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徐老师那本《历史语言学》就是在那家书亭里买到的，那是我这辈子认真阅读的第一本语言学著作，同时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本真正读不懂的著作：第一次没读懂，接着读了几次，还是没有完全弄懂。说实话，书写得挺好，文字简明，逻辑严密，可就是读不懂。弄到后来，“徐通锵”这三个字就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后来，在北大，王洪君老师给我们开学位课“历史语言学”，用的教材就是徐老师的那本书。这样，又硬着头皮啃了半年多，才总算真正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没有弄懂字里行间的论证过程和知识背景，书自然就不可能读懂。

大四写毕业论文，全班只有我一人选择了语言学的题目，原来的指导老师是沈建民老师——中山大学李新魁教授的研究生，题目是“汉白历史比较中的同源词问题”。还没等提纲出来，沈老师就要到上海师范大学师从潘悟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临行前，他推荐丁崇明老师来继续指导我。丁老师当时也准备到北师大任教，但他还是在离开昆明之前尽心尽力地指导我完成了论文的定稿。文章隐约有一个结论：“汉-白历史关系的分析必须要扩展到汉藏语系的宏观视野之中。”当然，我当时其实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结论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然更不会想到三年以后还要再次思考同样的问题。

写毕业论文的同时，我选择继续求学。后来，我考取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成为木霁弘老师的开门弟子。木老师原来的专业就是古汉语的教学和研究。或许是本科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因，也或许是导师的影响，我对自己的专业一直心不在焉。老木心知肚明，先同意我做一篇题为“语言学视野中的神话”的硕士学位论文。接着，因为他最好的朋友陈保亚老师正在北大中文系任教，老木又极力鼓动我去攻读陈老师的博士。谁都没想到，等到报名的时候，我才发觉：当年的招生目录中根本就没有陈老师名字。一打听，陈老师当年在香港做访问学者，还不能带博士生。无奈之下，只好听从陈老师的建议改考徐老师。

报完名，心里更没底了：毕竟抛开语言学已经两年多，改考的还是徐老师。老木也没辙儿，只好拼命安慰我：“没事儿，肯定能考上，实在不行，帮你先找一家单位挂着，明年接着考陈老师的。”还能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朝前闯。好在徐、王、陈三位老师的书已

经囫囵吞枣啃了几遍，外语也准备了半年多，还不至于完全绝望。

2001年元月，没联系任何工作，抱着“决死”的悲壮心情，隐隐中带着几分侥幸，离开昆明去参加北大的考博英语培训班。等培训结束，已经临近春节，索性就待在老乡的宿舍里继续复习。那段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了沙尘暴的暗无天日、肆虐横行，一种生死未卜的情绪和前所未有的孤独感黯然而生。

春节过后，北大开学，我本想隔几天再去拿准考证，段炳昌老师一个电话找到了我：“陈老师到处找你呢？说是徐老师想看你的材料，可中文系没有。”这一下，弄得我茶饭不思、鸡犬不宁。到中文系一问，管研究生的老师不由分说：“你把材料寄哪儿去了，赶紧找去！”一句话噎得我差点背过气去。接下来几天，只有一个人到处追查报名表的下落，哪儿还有心思准备考试。临到头，才发现当时中文系五院装修，临时挪了办公地点，凑巧就把我的报名表给混在其他材料里。考试前两天，我总算拿到了准考证。虽然是虚惊一场，可自己的心情就此一落千丈，真想卷起铺盖走人——太不负责了？这就是北大？北大中文系怎么是这个样子？小肚鸡肠的我就此对北大恨之入骨。许多年后，当学生问在北大学到什么时，我恶狠狠地回了一句：“把北大图书馆烧了，北大什么都不是！”不过，气愤之余，徐老师给我的感觉一下子亲切了许多：如果不是徐老师要看我的材料，我等考试前一天再去拿准考证，那岂不就“壮志未酬身先死”？

考试，自然是一团糟。总之，一考完连复试都不想参加了。本想鞋底抹油一走了之，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够汉子——太给徐老师丢人了。只有再次硬着头皮，怀着一肚子的忐忑不安走进了教室。还好，陈老师知道我急着回校，安排我第一个面试。那天，我是第一次见教研室的三位老师。陈老师和王老师问了几个专业问题，还好都顺利答了出来。徐老师一直没多说话，笑眯眯地坐在一旁。临末了，只问我：“你自己感觉考得咋样？”我脱口而出：“英语没考好，理论语言学一锅粥，语言学史还可以。今年不行，我明年再来考。”三位老师相视一笑，宽慰了几句，我的口试就画上了句号。

回昆明后，我感觉肯定没戏，就一门心思写硕士论文。等知道英语差两分后，仅存的幻想和侥幸随之彻底破灭。那年，段炳昌老师开始招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的博士，听说我在北大考砸了，就建议我去补报一下名再考云大。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一口回绝了。想来段老师当时一定很生气，说不定还觉得我输不起，破罐子破摔。过了大概一个月，老木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徐老师已经给北大打了个报告要破格录取我，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能成。我听后也没多想，总觉得挺玄乎：毕竟英语不到线，专业课成绩也不太好。没多久，我真的接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打开通知书时，那种大难不死、劫后重生的感觉，至今历历在目。

结果自然皆大欢喜。我就成了徐老师的关门弟子。不过，有一点我始终都弄不明白：我的表现从头到尾一塌糊涂，徐老师怎么会招我呢？这个谜团直到去北大后才得以解开。一开学，我跟陈卫恒去拜访徐老师。没聊多久，徐老师就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招你的原因很简单。第一，考试前你从来没跟我联系过，就凭自己的能力来硬考。第二，面试时你跟我说的考试情况跟最终的成绩一模一样。说明你头脑清醒，对自己认识得很清楚。第三，你有语言优势，以后可以做汉藏比较。”听罢，我才恍然大悟。徐老师那宽容、坦诚、睿智的长者风度就此一览无余。

问 道

开学以后，徐老师给我量身订制了一个培养计划，要求修完教研室开设的“历史语言学”、“语言学方法论”、“理论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非线性音系学”、“西方语言学史”和现代汉语教研室的“汉语方言学”。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必读书目，如梅耶的《历史语

言学中的比较方法》、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周法高的《上古汉语和汉藏语》、包拟古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白保罗的《汉藏语言概论》。他还跟我讨论并初步确定了学位论文的方向：继续原来的思路，弄清楚汉语和白语的发生学关系。就这样，整整三年，我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第一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专心听课和大量阅读。专业课、英语课、二外、政治课，从早到晚，疲于奔命。本来以为专业课不会有太大难度，孰料第一学期的“历史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拿“理论语言学”来说，许多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闻所未闻，整个人都被淹没在语言学术语和论著的海洋之中。“系统功能语法”用的是原版教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以前我从来没有读过英文版的语言学著作，学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非线性音系学”用的倒是王老师自己的著作。不过还是读不懂。后来，张和友还跟我说：王老师的东西不好懂，因为其中的理论积淀很深。最后，第一学期选二外法语，第二学期改选德语，都没能去参加考试。不过，好歹已经可以凭借字典来阅读文献，还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课程中，收获最大的还是王洪君老师的“历史语言学”和王福堂老师的“汉语方言学”，后来我的学位论文中采用的“历史层次分析法”其实就来自“二王”老师的点拨。

第一年下学期，徐老师给我们开“语言学方法论”，主要讲的是他提出的“字本位理论”，教材则是他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当时，“字本位”理论刚刚提出，在国内语言学界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批评者中，不乏徐老师的故交好友。还记得毕业答辩前，王洪君老师叫我到中央民大给吴安其老师送论文。他就跟我说：“徐老师的《历史语言学》绝对是经典，而‘字本位’那绝对是一个失误！”直到去年在丽江开会，吴老师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在语言研究中强调什么本位，那是违背历史语言学常识的。”一开始，我对“字本位”也是满腹狐疑。听课过程中，通过跟徐老师的不断交流和相关论著的研读，我才慢慢发现：大多数人其实根本没有时间仔细琢磨徐老师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批评大多充满了偏见、误读和误解。课程结束以后，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一篇题为《字本位源流》的文章交给徐老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大体来看，‘字本位’学派的特点已基本形成：这一学派强调语言系统内外的‘打通’和整合，以洪堡特-沃尔夫的‘语言世界观’作为哲学基础，以中西语言学理论的结合为基本思路，以‘结构关联’为指导思想，以‘对比’为主要方法，强调在历时和共时、例外与规则、理论与应用的三重互动中研究汉语的特性，但最终的着眼点仍然是探求语言的普世性。”

这其实也就是我在北大求学三年的基本心得。第二年新学期开学后，徐老师见到我就说：“文章写得不错，我帮你改了改，你把它投出去。”谁知我生性疏懒，后来就没再去修改。一直到临毕业前，段炳昌老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思想战线》。稿子本来已经被采用，可编辑觉得字数太多要求压缩两千字，我觉得太伤筋动骨有损原文神采，二话不说，一口回绝，结果文章胎死腹中，在我的电脑里一呆又是三年。

雕 龙

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后，我就开始论文写作。首先是做文献的梳理。当时我们已经从燕园搬到了万柳。随后一年多时间，我都是早出晚归，到北大图书馆和国图查文献、创资料。

论文一开始进展很快。先是给徐老师递交了一篇题为《白语研究一百年》的文章。他看完后告诉我：描述太多，归纳太少，分析不透。不过，他还是同意我在王洪君老师主持的语言学讨论班做一个报告，但必须把汉白语言关系研究的症结和关键给谈清楚。那次发

言, 我的一个中心意思大概是: 如果抛开白语的形成史和复杂的语言环境, 永远不可能弄清楚汉白语言关系的真相。徐老师当时没吭声。几天后, 他叫我到畅春园找他, 明确给我指出一条思路: 参照沈兼士、严学宥的词族比较法, 以语义系统的分析为主线, 还原汉白语言关系的真相。为了帮我拓宽思路, 他还把在柏克利访学时马提索夫赠给他的《藏缅语变异语义学》一书拿给我, 叫我用心揣摩。这一番点拨, 我的眼前不由得一亮, 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没多久, “非典”爆发, 人人草木皆兵、道路以目, 本来拥挤不堪的北京刹那间近乎“死城”, 连一向人满为患的北大图书馆都变得门可罗雀。我就一个人躲在新馆顶楼的台湾美国文献阅览室, 泡一整天, 抄录全广镇的《汉藏同源词综探》。回万柳以后, 就接着用《云南省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和《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来切分白语关系字的历史层次。

完成六万字的研究综述后, 我突然发现出了大问题: 按现有思路, 我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 大家的语料都差不多, 可结论却大相径庭, 要么汉白同源, 要么彝白同源, 而白语的形成过程仍然还是一团乱麻。更要命的是, 同词族未必同源, 同词根也未必同源, 凭现有的任何理论模式根本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同源”和“接触”。如果做一篇博士论文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证明别人的结论、验证别人的理论、为别人增添注脚, 那这样的论文还不如不做。我这才真正明白陈保亚老师提出的“无界有阶”理论模型中的“无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想通这一点以后, 我有点气急败坏! 紧接着就按捺不住拨通了徐老师家里的电话。一听来意, 他当下就叫我带上综述报告去他家。第二天, 一进门, 我就不由分说, 竹筒倒豆子地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喷了出来。中心意思很明白: 没法子再往下做了, 要改题。徐老师一如既往平静地听完我的“哭诉”。问了一句: “那你换个什么题?” 我说是以“研究综述”为基础做语言学史, 题目叫“20 世纪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史”。徐老师听完后, 还是没多说, 只叫我先回去, 等他看完“综述”后和教研室的老师商议一下, 再给我回话。

没两天, 徐老师又把我找到畅春园。他先肯定了我的前期报告, 觉得我找准了问题的症结。然后就话题一转: “我认为你没必要换题。”我一愣。“你还是要做具体的语言史, 语言学史的问题以后再说。”紧接着, 徐老师告诉我: 如果凭现有材料既然弄不清汉白语言关系, 那么就换一个角度, 去复原白语的历史语言环境, 分析白语怎样把不同来源的语言因子整合成为一个同质性的系统。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走出畅春园, 我豁然开朗: 折腾了半年多, 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出口。

通过再三考虑, 我最终确定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和“三重证据法”相结合把白语分为原始白语、古代白语和现代白语三个阶段, 同时重点分析白语演变的独特机制——“多源因子的同质化”。开题时这一思路得到了教研室各位老师的一致肯定。接下来的写作, 我先用三个月完成关系字层次的切分和统计。2004 年 4 月 25 日, 在调整章节结构和删并多余线索之后, 我如期交出了 25 万字的论文初稿。徐老师仔细审阅后告诉我: “没大问题! 可以定稿!”

现在回想起来, 在师从徐老师的三年时间里, 我的最大收获其实不是那个所谓的语言学博士学位, 而是作为一个学者起码应该必备的独立精神、原创理念和问题意识。

第三年, 我选择回云南大学任教。徐老师大力支持, 说: “你早晚都要教书的。教研相长, 教学相长, 自古皆然。你看陆俭明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 陆老师主持的《现代汉语》好像刚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还有, 徐老师还觉得云南是做语言学研究的天然土壤, 语言学家可不能离开自己研究的语言, 回云南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伤 逝

离开北大后, 我回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临走, 徐老师说最担心我会被繁琐的行政

事务捆住手脚，没时间做学问。结果一切都不幸言中，先是班主任，后是科研秘书；第一年忙着报学位点，第二年忙着教学评估；担任的课程一门接一门：少数民族语言概论、语言人类学、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论文一篇没写，连学位论文都没时间改。疲于奔命之余，一想起徐老师，就恨不得挖地三尺钻下去，连电话都不敢打一个。

回去不到半年，爱人说要动手术，她一个人在学校很不方便，问我能不能去照顾她半年。情急之中，只有厚着脸皮向徐老师求援，说自己想到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请徐老师帮忙向黄行老师推荐。他二话没说就给我写好推荐信，还亲自出面跟黄老师联系。谁都没料到当年社科院突然停招在职博士后，害得徐老师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现在，一想起这件事儿，我心里就隐约作痛，感觉自己亏欠徐老师太多，永远都不可能还清。

去年国庆节，我到北京休假，带着爱人去看徐老师。第一眼就觉得老人瘦了，但精气神都还不错。我跟徐老师大概谈了谈自己回去以后的情形。他一边听、一边宽慰我：“年轻人总是要做点事儿的，学问可以慢慢做，不用着急”。后来，说到汪锋已经博士后出站留在中文系当老师，徐老师就站起来，颤巍巍地站到椅子上，给我找汪锋的博士论文和出站报告。临走，徐老师一定要送我们到楼下。告别时，他突然抓紧我的手，很长时间都没松开。我们走出很远，回头一看，徐老师还站在楼下，朝我们挥手。等走到蔚秀园，爱人才悄悄告诉我：“师母说徐老师有可能是胰腺癌，不过大家还瞒着他。可他刚才一定要送我们下楼，说不定自己已经感觉到什么了。”我一听，心情刹那间变得异常沉重，唯有希望那不是真的。

十月下旬，丁崇明老师到昆明出差，给我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消息：徐老师真的是胰腺癌，目前已经住院了，情况很危险。11月2日，我赶到北京，跟王洪君老师通完电话，知道徐老师在北京肿瘤医院。第二天，我们夫妻和张和友一起赶到了医院。徐老师一见到我，两眼一亮：“路那么远，就不要来了，工作要紧……”声音很微弱。因为担心影响他休息，没多久，我们起身告辞，老人抓住我的手，很有力。我说：“徐老师，您好好休息，我过段时间再来看您。”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11月26日清晨，一觉醒来，才发现张和友前天夜里发来的短信：“立权，徐师于今日西去，我们深感悲伤。”时间是11月25日22点47分。这条短信，我锁定在手机里一直留到现在。11月29日，我再次飞往北京。第二天，八宝山殡仪馆，我们送走了徐老师。临别时，到场的同门们在遗像面前留影。在我印象中，那是徐老师和自己的弟子的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王洪君老师要上课，没能赶来）。那天，千里迢迢赶来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的李葆嘉教授，王老师的博士张新华也从复旦大学赶来，只可惜晚了一步没见到徐老师最后一面。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到场的，还有徐老师的挚友吕必松教授和鲁川教授。

开学前两天，在云南师大正门旁的清华书屋，我意外地买到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是什么》。这本书和《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均是徐老师的封笔之作。几天后，我收到一个从北京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又一本《语言学是什么》，落款徐涛——徐老师的公子。在我毕业离开北京之前，徐老师已经在倾尽心力写这本书。他一直推重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把它定为我们的必读书，还称之为“语言学中国化”的典范，那也正是这本《语言学是什么》和徐老师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

杨立权
2007-3-21
云南大学英华园

绪论 走出“非汉即彝”的二元论黑洞

0.1 反思：白语研究一百年·0.2 黑洞：“汉白同源”论和“彝白同源”论·0.3
症结：共时精描与历史还原的脱节

0.1 反思：白语研究一百年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汉藏语系的众多语言中，白语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从春秋战国以降，其间经过秦、汉、南诏大理国直至元、明、清，白语族群和汉语族群、藏缅语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文化交融和语言互渗。最终，无论是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的层面，现代白语都激生出一种集汉藏—非汉藏等多元因子为一体的语言特征。这也就使得白语成为进行汉藏民族史研究和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时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故而，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中外学者相继对白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迄今为止，白语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史研究和共时研究这两大方向的六个领域，包括白语系属的探讨、古白文的考证解释。白语方言的调查描写、白语语音的科学分析、白语语法的研究和新白文的推广教育。

0.1.1 白语系属

最早对白语系属研究的论述是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从19世纪末至今，这一问题一直都是诸多中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和重心。大体而言，学术界对白语在汉藏语系中的位置虽然尚未达成共识，但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四种：孟吉蔑语系、汉语、彝语支和汉彝混合语。

将白语归为“孟吉蔑语系”的一支，原来是法国人拉古柏里(1887)和英国人戴维斯(1919)的看法。在国内，除了丁文江先生，支持者不多。后来闻宥(1940, 1949)还著文对这种说法加以否定。但是在国外，这种划分法直接支持了曾一度流行的“傣族创建南诏说”，故而在西欧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影响极深。然而，无论是在拉古柏里《汉语以前的中国语言》还是戴维斯的《云南——印度扬子江的链环》中，我们所能见到的都只是白语和傣语词汇的零星对应材料，并不具备太强的说服力。事实上，如果拿白语和任何一种汉藏语言来比较，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对应。

把白语视为一种汉语变体的说法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深受大多数白族学者的赞同。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剑川白族学者赵式铭和张海秋就相继在《白文考》、《剑属语言在吾国语言学上的地位》中对白语中积淀着的“古汉语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进而明确提出：白语是汉语

的一种方言变体。在他们看来,白语的“言语声音,保存了三代以来之古语古音”。“汉语说”一来与汉族、白族文化相互渗透的事实相符。二来还有确凿的汉语文献证据。如《通典》“松外诸蛮”条:“其地有数十百部落……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先世汉人……言语虽稍论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月为岁首。”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白族起源争论”中,秦凤翔、张海秋和徐承俊又进一步对“汉语说”加以阐述。他们指出:“现代的白语与汉语为同一系属的语言,是以古楚语为基础,掺有古蜀语的成分,自齐梁以至明初独立发展而成。”(杨等 1957, 134)在国外学者中,白保罗认为汉语族包括原始白语和原始汉语,现代白语方言由原始白语发展而来,原始汉语则进而分化为“原始闽语”和“上古汉语”。再后来,郑张尚芳在本氏的基础上提出了“汉白语族”和“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的见解,他给白语的100个核心词找到了相对应的古汉语关系词(字),整理出“白语同音字汇”,并指出“白语几乎完全可以用汉字写出,不过当地用了一些土字和假借字字形成民间应用的白文”(郑张 1999, 40)。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用现代白语读音训读古汉语词(尤其是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的词汇)。这种做法最早从李澡和赵式铭开始,后来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汉兴《白族话中的古汉语词素例考》(1991),杨品亮《现代白语中的古汉语词》(1990),颜晓云、陆家瑞《史载白语丛考》(1997)、段伶《试析南诏的语言》(1994)和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的一支独立语言》(1999)。他们大多具有较深的国学素养,对古典文献极为熟悉。但是,多数学者(尤其是白族学者)基本循“训诂”一路,而郑张尚芳则主要以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方法来寻找“汉白同源词”;前者偏重本族语感,但零碎而不成系统,后者注重挖掘规则但基本只能依赖二手语言材料。如在赵式铭的《白文考》中的释例:“年曰霜。《说文》‘岁功以雪始以霜终’。李白诗‘陛下寿三千霜’”。“明日望。《五人墓碑记》:‘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江曰工,陶潜诗‘停云蒙蒙: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在赵式铭看来,现代白语中“年、月、江”的读法反映了古汉语的读音,大体和古汉语词“霜、望、工”对应。进而,这种“活白语”和“死汉语”的对应就成为了白语作为汉语亲属语言的铁证。经过不断挖掘,这一类的铁证虽然越积越多,但是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2000年,南开大学的博士生袁明军在那公畹和邢凯的指导下,通过对白语方言的补充调查,初步构拟出了原始白语的声韵系统,并采用“语义学比较法”大致断定白语和汉语具有发生学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调查和构拟基本是以郑张尚芳(1999)¹中的“汉白同音字表”为框架的。换句话说,他在展开调查和构拟前实际是以“汉白同源”作为重要前提和预设的,所以其证明过程就深层而言更像是一种隐蔽的“循环论证”。同时,以前有限的调查、描写和分析为基础,仅凭一人之力就想在短期内全面把握一种语言的主要方言变体,并构拟出一个比较成熟

¹人名后面的数字表示年份,代表这个人在该年发表的著作或研究成果。后同。

的原始语言系统来,这委实是一件勉为其难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在国内民族语学界,最通行的主流说法是把白语归为藏缅语族的一种分支语言。其中,李方桂(1937),罗常培、傅懋勳(1954),赵衍荪(1982),徐琳和赵衍荪(1984),吴安其(2000)明确将白语划归彝语支。赵衍荪明确指出:“白语和彝语以及其他彝语支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某些对应现象和同源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与之相比,周耀文(1957, 1978),马曜(1957),杨应新(1998)和杨品亮(1989)则多方论证了白语的许多语言特征既非汉语所具,更非彝语所有。如杨品亮就指出:“白语和汉语之间是同源异流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亲属语言。……根据白语的历史轨迹及现状,按语言系属为标准。白语不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而应单立为白语支。”此外,戴庆厦、傅爱兰、刘爱兰、刘菊黄(1989)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将白语单立为“白语支”,但仍和缅彝语支同属藏缅语族的南部语群。还有的学者虽将白语划为藏缅语的一种,但语支所属未定。这其实只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的权宜做法。在国外,马提索夫(1997)也明确将白语划为“藏缅语族白语支”。支持“白—彝同源”说和“白—藏缅同源”说的学者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力图实现“内证”和“外证”的统一。其中,吴安其(2000)的做法堪称典范。但这些论证大多深受篇幅和语料来源所限,无法充分展开。同时,对具体语言证据的分析常常失之粗疏,未能充分揭示出共时系统中的时间信息。此外,“白—彝同源”说和“白—藏缅同源”说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前者揭示的时间层次较晚而后者较早。但许多学者却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近年来,有的学者则认为:只有抛开传统的谱系树模式,采用分化和接触相结合的视角,把白语归为一种“混合语”,才是一种妥当的做法。如罗美珍(2001)就认为:“其实混合语是很难将其分类的”。这种处理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的大理白族学者李澡在《大理县志稿·卷六·方言》(1916)中就已提出:“洎夫宋元,其固有之语言仍为蛮,所谓‘白子国话’是也。嗣有保(彝)族杂居在苍山西南隅,语言又复混合,两语意绝不通中土”。后来,罗常培先生在《语言学在云南》(1943)一文中也曾提出白语是一种“夷汉混合语”。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绍尼(1992、1997)和罗美珍(2001),相继对白语作为混合语的诸多特征进行了充分论证。李氏在其《白语基数词和汉语、藏缅语关系初探》中动用了丰富的汉语和藏缅语材料指出:“白语是汉语、藏缅语混合语形态,而且混用的汉语占8/10……用彝语支属来概述白语,显然内含太窄,它已包容了以汉语词汇占绝对多数的混合语汇形态了。”这对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所确信的“基数词一般不是借词”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反诘。罗美珍则具体地描述了白语语法的二元混合形态。毋庸置疑的是,“彝汉混合”论其实是一种“汉白同源”论和“彝白同源”论相互调和、折中的产物。表面看来,这种解释最省事,也能自圆其说,似乎兼顾了前两种思路的长处和缺陷,以分处不同时间、层次的两种亲属语的深度接触和彼此渗透来分析白语语言特点的形成。然而,这种处理同样回避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白语到底是汉语还是藏缅语的近亲?白语早期的

语言关系到底怎样?除了汉语和藏缅语,难道白语就没有与其他亲属语和非亲属语发生深度接触的可能?白语和原始汉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诸多方言变体的关系如何?如何区分白语中累积的不同时间层次的同源词和借词?白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古代白语和现代白语是不是一回事?……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蕴涵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以后的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理论突破,就必须彻底解决这些难题。

除了以上所述的四种划分法外,徐嘉瑞将白语归为汉藏语系的“民家语组”,向达将白语归为氐语中的突厥语支的一种,亦有人将白语归为羌语或卡伦语的一种。但这些说法大多缺乏足够的语言材料支持,影响也不大。

0.1.2 古白文

“古白文”研究一直是白语学界和白族文化学界的热门话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白族起源”争论开始,许多学者(主要是云南学者和白族学者)围绕“古白文的有无”展开了长期的探讨。其中,徐嘉瑞(1949)首创“白族无文字”说。杜乙简(1957)也认为白族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独立成形的白文。徐琳和赵衍荪(1949)曾否认白文的存在,但后来又相继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学者都确信,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曾存在并使用过“白文”——借鉴汉字的构字方法来另造新字以记录当时的白族语音。后来,在朱明王朝平定云南的过程中,原有的白文典籍被明军焚烧殆尽,古白文自此夭折。50年代,杨堃和孙太初率先提出“白族有古文”的观点。后来,林超民(1980)、段伶(1981)、张增祺(1986)、马曜(1989)、赵衍荪(1989)都曾对白文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但对白文的全貌认识较深,材料最全的则是杨应新的《方块白文辨析》(1991)一文。他指出:现今残存的方块白文文献资料包括白文史籍、白文残瓦、白文经卷、白文碑刻、白文曲本、白文释文和白文对联7种。最有价值的是白文经卷,其中夹注着大量的“古白文”,如《仁王护国般若经·嘱果品》第八卷轴中,正文汉字1800多个字,白文旁注约1700多个字,白文疏记多达4300多个字。白文数量比汉文多。如此看来,以后“古白文”研究的突破,恐怕只有寄希望于这批经卷的释读。

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白族学者开始从“有无白文”的争论中摆脱出来,并对历史文献典籍中存在的一些“知其形而不明其音义”的词语进行了释读和破译。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汲取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的方法或结论,利用现代白语的读音、意义,结合具体文献的上下文来说明具体词语的来源和演变。如徐琳、赵衍荪、赵楷对白文古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的考释。再如徐琳后来发表的《南诏七个山川土地名量词考释》(1995)和《南诏大理国“驃信”“摩诃罗嵯名探源》(1996)。段炳昌则在其《缅语词“乌底巴”的白语训读》(1997)一文中纠正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说法,认为缅语“乌底巴”来自白语,意为皇帝。这些文章大多言之有据,对民族史和民族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古白文的研究虽然向来是一个热点,但大多数学者都基本在“有无白文”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很少有人用语言与文字相关联的视角和语言学与文字学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整体的分析和研究。至今,仍有很多疑问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白文”如果的确存在,那么这种文字的使用范围有多大?它当时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它是否曾一度取代“汉字”成为通用文字?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文字体系对古白语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古白文”和“新白文”的相同命运说明了什么?不考虑汉字系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解释白语发展的动因,也无法准确预测白语的归宿。

0.1.3 语言调查

一般而言,大多数白语研究者(尤其是本族研究者),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多大兴趣。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情况才得到了初步扭转。当时,许多学者因战乱南迁昆明。其中有一些语言学家对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闻宥、张琨和袁家骅都曾对白语进行专门调查。后来,闻宥发表了《民家语中同义字之研究》和《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袁家骅则著有《剑川民家故事记音》(1942,未刊),而张琨的调查所得却如石沉大海。但这三人的调查都不如罗常培先生做的细致和全面。1942年,他专程到大理进行白语调查,对主要的白语言加以初步的记录和描写。后来整理而成的报告计九种,依次是:《兰坪拉马语调查》、《大理民家语调查》、《宾川民家语调查》、《邓川民家语调查》、《洱源民家调查》、《鹤庆民家语调查》、《剑川民家调查》、《云龙民家语调查》和《泸水民家语调查》。由于战乱的影响,他的调查时间、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如他的调查合作人多为当时大理师范学校和五台中学的学生。不难推想:这些调查应当是比较粗略的。但罗先生受到过传统汉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方法的严格训练,他的调查本身就已经对白语是一个实质性推动。如他进行剑川白语调查时的“发音人”赵衍荪后来就走上了专门从事白语研究的道路。

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牵头,组织了有中央民院,云南省民语委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州共同参加的白语调查小组,先后到大理、迪庆和怒江对白语各方言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他们在第三次调查中,搜集了43个点的语言材料,归纳了近二十个点的音位系统,并初步对白语方言区的划分予以探讨(徐琳、赵衍荪 1984)。后来,这些调查的成果先由徐、赵二人整理,以《白语概况》为题发表在1964年第4期的《中国语文》上,更详尽的描述则是198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白语简志》。该书第一次对白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和方言及文字予以系统、科学的阐述,出版后逐渐成为了许多语言学家了解和研究白语的必备工具书。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那时的调查及相应的成果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调查点虽具代表性但不够全面。《简志》一书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对除了大理、怒江、迪庆等聚居地以外的白语方言点,基本没有调查,所以那些地方尽管“还聚居或散居着近4万白族人民。但他们属

于何种方言土语,现在还很难进行较准确的统计(徐赵 1984, 116)。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都没有明显的改观。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相关的调查报告微乎其微,如刘援朝的《元江白族亲属称谓系统》(1998)和王锋的《西山白语概况》(2001)。其次,调查的词汇数量偏少(尤其是对白语特有的古语词和文化词的调查)。《白语简志》的作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就在以后的田野调查中有意识地扩大了调查范围,相关成果结集为《白语词典》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但这本词典以白语中部方言为中心,而北部、南部方言以及其余方言点的情况依然空缺。再次,对许多白语方言的交叉地带有所忽略,描写较为粗疏。就以大理州西北的云龙白语而言,那一带的一些次方言无论从语音、词汇、语法来看,都明显带有三大方言交叉影响的特点,在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隔里不同语”的情况。至今,白语研究者对白语内部方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的相关调查仍然是一个空白。

0.1.4 语音分析

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结束后,白语的研究一直停留于对已有调查成果和文献材料的整理、挖掘。只有李绍尼、艾杰瑞和陈康对白语语音的分析和研究得到了一定突破。其中,李绍尼《论白语的“声门混合挤擦音”》一文详细阐述了“白语 21 调紧音”当为“42 调声门混合挤擦音”的原因。与以往的语音调查主要依靠调查人的听音、记音不同,李绍尼和艾杰瑞在研究时使用了先进的语音实验仪器,操作的程序较为严格,所得的结果相对客观而可信。他们还力图结合语语音的分析予以理论的阐释。如在《云南剑川白语音质和音调类型》(1990)中他们认为白语证实了法国学者 Dell 对“五度标调法”的评价:“五度标调法在东南亚语言中普遍用来表示声调高低的方式已经无法标注音高如此大的变化。它只能表示高低,不能够表示音节的长短”。而李绍尼(1992)还指出对白语的音质分析表明“声调并不完全由声带颤动而产生的基频决定:往往由其它发音机制引起的不同的音高与基频一道共同制约声调的高低。”李绍尼和艾杰瑞近年的研究力图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说明白语不同于汉语的语汇音特质,进而阐明白语和彝语支语言的发音机制上的相同或相似。这在《彝语、白语的音质和匀会厌肌带的关系》(2000)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带有明显的不足。如他们的实验对象人数有限,故而这些对象的“社会变量”(职业、受教育程度)和“生理变量”(年龄、性别)等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可信性或代表性。最可靠的方法恐怕应该是扩大实验对象的范围,从而尽量消除各种变量的负面制约。

与李绍尼、罗杰瑞的路子不同,陈康力图通过汉白语音的历史比较和白彝语音的共时比较来阐明白语声调的混合特质。在《白语促声考》(1992)中,他确信:“白语的 8 个调是彝、汉语言舒、促融合的产物”。其中,白语 44 调=彝语支清声母阴促调+汉语阴入声;白语 42 调=彝语支浊声母阴促调+汉语阳入声;白语 21 调=彝语支紧调特征+汉语阳平声。进而,他认为从声

调来看,白语“是具有其原始彝语底层和汉语成分融合了的一种混合语”。由于共时和历时的交叉互证,陈康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不过,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白语中的彝语因子比汉语因子古老,故而前者构成底层。但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证实原始彝语和原始汉语“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么以任何一种来作为白语的“底层”都是不可靠的。从共时材料来看,白语的底层恐怕也是一种“混合的底层”。要理清底层中各因子在发生学上的先后关系,不能局限于彝语支语音的范围。

0.1.5 语法研究

白语的语法研究在《白语简志》出版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一直就处在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状态之中。其间偶现的一些对语法现象的研究大多缺少足够的深度和独立性、采用的材料、理论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其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学者们对白语语法的分析结果基本是用来充当语言比较的证据。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赵衍荪(1981)对现代白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比较。第二,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白语中的独特构词现象。如赵衍荪(1996)、段伶(2001)对白语语音屈折构词现象的分析,王锋(2002a)对白语名词、量词及其体词结构的研究。第三,以中心方言代替白语整体的研究取向。相关研究者大多以中部剑川方言和南部大理方言的一些方言点的语法现象为中心,北部碧江方言和其余方言地带的语法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关注,甚至还缺少基本的摸底调查,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更是一个无人涉足的空白领域。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至今仍然很少有人意识到白语语法研究在整个白语研究中的重要性,更没有人意识到白语的归属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和语白语法描写与语言解释的明显滞后之间的深层关联。

0.1.6 新白文

“新白文”是以1957年的白语材料为基础设计的。最早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拟定于1958年,但一直没有推行。1982年,由大理州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以剑川县金华方音为标准,参照1958年的方案制订了拉丁白文。这一方案包括27个声母,33个韵母和8个声调(其中以调号前加r表示紧调,第8调不加符号)。同年,剑川县率先展开了白文师资培训,由赵衍荪和徐琳执教。后来一共举办了10期培训班,加上由省民语委牵头组织的一次中级班,剑川先后培训了白文师资450人。当时,剑川一直是白文推广的重点示范区:1984年6月,成立县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后来举办了29个白文扫盲班和一个白文初级班;1986年,在西中小学开始“白汉双语语文教学实验班”;1988年10月,设立白汉双语广播台;1990年冬,由省民语委,大理州主办,在剑川召开了白汉双语语文教学和白文扫盲现场会。不久,云南省民语修改了第二套白文方案,使之能同时适用于以大理为中心的南部方言区。1993年6月,第三套白文方案通过。

应当承认,1982年以后新白文的制订和推广确实是白语研究者的一大成果。通过学者和政